礼物的回归

全球观念下的欧洲史

THE RETURN OF THE GIFT

European History of a Global Idea

[美]哈里·李伯森 著　赖国栋 译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Harry Liebersohn

The Return of the Gift：European History of a Global Idea

© Harry Liebersohn 2011

This publication is in copyright. Subject to statutory exception and to the provisions of relevant collective licensing agreements，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文本依据剑桥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翻译

中 文 版 序

对中美两国学者而言，目前是个历史性的时刻。每年，大量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来到美国，丰富了各大学的校园文化。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访问中国，参与思想交流的盛宴。尤其令人振奋的是，我们看到太平洋两岸的访问者不仅囊括科技领域的专家，还涵盖了大量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双方开始反思。我相信，这种反思将丰富各自文化，引导中美同仁扩大文化视域。

我希望中文版的《礼物的回归》能提供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一些不太明显结构的个人见解，进而以适度的方式参与到这场大对话中。回顾过去，将有助于读者理解西方社会结构的性质以及美国与外来者在早期接触期间这些结构所处的地位。众所周知，礼物交换在东亚，尤其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也存在礼物赠与经济，只是不太明显而已。我希望本书读者能更清晰地认识到，礼物交换在西方社会由来已久，且在美国仍然具有持久的重要性。

中西方旅行者的互访使一些思想家切身感受到彼此文化的特性，满足了各自的好奇心。当然，这种长期交流访问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有了，有时还卓显成效。实际上，这些交流在中世纪以来的西方历史中产生了重要甚至是革命性的影响。哥伦布很可能是在读了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描述后，才激发他的雄心壮志，试图找一条通往富庶东方的较短航线。生活在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留下了不少记录，他们的记录融入了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证明了非基督教国家的风雅。至于18世纪西方仰慕中国文明，耶稣会士则起了重要作用。离我们较近的是另一个方向的一场运动，史景迁在《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1981 年)中对此有所描述,那就是 20 世纪早期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出走西方(包括日本,这是接触西方思想的一条途径),他们对后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然而,他们在异国他乡实际上学到了什么呢?他们即使在异域学习、生活若干年后,又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了对方的独特逻辑?旅行史告诉我们,自欺欺人危险重重,同时进入另一种文化也是障碍重重。人们对异域文化的刻板印象是如此之多、如此根深蒂固,他们很可能会形成一种有局限而又扭曲的看法。不管观察者如何用心,都可能无法洞悉异域文化最基本的一些价值。

礼物的历史揭示了一些价值,从表面上看,英美和其他西方社会可能不存在这些价值。我们很容易认同一种西方现代化理论,即传统欧洲社会的群体秩序(corporate order)逐渐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由自私自利的个体组成的原子化社会。1651 年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出版后,欧洲现代社会便逐渐出现了极端个人主义的形象,在此过程中,欧洲思想家也是助推者。在霍布斯之后,一些欧洲思想家达成一致,相信一种广为传颂而又具误导性的看法,认为欧洲社会的实际情况是以社群为代价换取自由。不管是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17 世纪以来的主流思想家都普遍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不管人们对此抱以信心抑或是为之扼腕。

然而,这是观察欧洲社会的维度之一。的确,定位于这种个人主义,可以让人们关注到几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惊人变化。问题是,它忽略了欧洲一些社团主体的不朽力量——这种力量在近代早期、社团主体发生转变时以及 18 世纪晚期以来创立新式共同体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所说的社团主体,主要包括行会、城镇、行业、社会等级、教会及其他。

还是以恩格斯为例。年轻的恩格斯因为要管理他的家族企业而前往曼彻斯特。他将曼彻斯特看成“落后”社会的产物,处于 19 世纪

30年代与40年代早期前工业德国时期，经济上死气沉沉，政治上家长制作风。恩格斯处在当时最“高级”的社会，即工业化的英国。令他惊讶的是英国社会的原子化，这一点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中得到了表达。他在开篇就怀旧地想起前工业化时期欧洲的传统社会，并将它们与现代社会中孤立的个体加以比较，结果发现现代社会全民皆贫困，工人阶级是物质贫困，中产阶级终日追逐财产，导致内心贫困。恩格斯认为，最简单的现代社会的表面就是个体的孤立。他警告德国读者要及时改革，以避免出现这种状况。恩格斯的著作有力地批判了自由化、工业化的英国，至今仍然是现代社会科学中的经典作品。不过，恩格斯在描述英国社会时，有些误导性、局限性的看法。恩格斯注意到了保守的家长制作风和官僚意识的力量，却不欣赏它们，实际上它们和基督教社会主义以及传播更广的中产阶级社会的家长制作风等运动一起，促进了19世纪的社会改革运动，同时为20世纪的福利国家提供了动力。恩格斯有敏锐的社会学视野，但他低估了个体竞争和阶级冲突之外的社会力量。

旅行者通常也用类似的肤浅分析来看美国。19世纪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访问者认为，美国社会支持个体对幸福的追求，完全抛弃了忠诚的纽带关系。然而，一些敏锐的观察者追问：是什么吸引力让美国人能够团结在活力四射而又稳定的社会里？

托克维尔便是这样一位细致入微的观察者。19世纪30年代，他从法国动身前往美国，起先认为美国是个贪婪的个人主义社会。不管怎样，他告诉受过教育的法国读者，美国社会是个嘈杂的商业社会。1835年，他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该书的中心思想令人争议，目的是要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即实际的美国社会井然有序。尽管存在个人主义，但它要通过协作机构运作。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些机构中最主要的是民间社团，它激活了政治程序和城镇生活，同时新教确立了一些共同习惯，起着内在规范与约束的作用。托克维尔透过美国人追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社会幸福的表面，揭示其内在的社会机制，这时他开始与欧洲上层阶级分道扬镳，不再认为美国这样的社会注定要陷入混乱。从社会理论的角度看，可以说托克维尔已经取代了霍布斯创立的现代社会模型，即只有国家政权才能遏制“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他反驳说，比英国社会更“现代”的美国，必须在个人利益原则上独立运作。

20 世纪初，马克斯·韦伯造访美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有悖于德国读者的期望。韦伯同样强调宗教和民间社团的作用，认为它们创造了一些社交形式，传播了美国社会的个人主义。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 年)也许就可以看作在反思美国及其民间合作能力。韦伯在撰写该作品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期间访问美国，像托克维尔一样，他认为自己是旅行者，能洞悉潜藏在公共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返回德国后，他决心反对德国精英的一些偏见，就像托克维尔试图改变法国人的看法一样。韦伯比他的法国前辈更为用功，深入到所谓新教的宗教心态中，揭示出历史上特定的、旨在自律的宗教形式。韦伯和托克维尔一样，明确表明不存在根据利己主义原则组建而成的纯功利社会；它与社会现实混淆时，便成为了一幅美国社会的讽刺画。

在考察礼物理论时，我们看到了众多经典社会思想家创立的深刻思想，且一则比一则精辟。托克维尔、韦伯及其同时代的人没有注意到礼物交换。顺便说一下，他们忽视礼物交换实际上也是本书的起点之一。他们带着急躁的心情肤浅地看待美国社会，使我们意识到有必要找出深层的社会联系。历史哲学将社群和社会或传统和现代相对照，认为现代史过程中存在从集体到个体认同上的转变，经典社会思想家与此针锋相对，追问协作形式(有时是由来已久的，有时是新创的)如何能在现代社会**内部**得到发展，正如他们强调宗教所揭示的那样，传统价值通常可能持续、经历变化，塑造一些持续到今天的文化模式。

我们追寻先贤的足迹，转向礼物理论。超越社群—社会的二分，也将促进我们理解现代社会，找到现代社会用以结合个人经济行为和协作网络的更复杂的方法。

1925 年，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在一篇著名的论述中阐释了礼物理论。莫斯的礼物概念不仅指物品交换，而且指引起互惠姿态的各类行为。这个词的专门含义不同于一般的法语或英语用法，因此与欧美人对话时可能会产生混淆。我想起了前些年待在柏林时结识的一对俄罗斯夫妇。他们邀请我和我妻子去他们家喝咖啡，同时询问了我近来研究的主题。我说是“礼物赠与”，他妻子则应声说：“如今，礼物并不重要——我们俄罗斯人都不怎么交换礼物了。”从日常意义上的送花、送酒或给孩子送礼物来说，礼物可能并不重要，不过正是她邀请我们去她家这种行为证明了莫斯对“礼物”的广义界定。这种初次邀请所唤起的正是他们心中所想的互惠——回请，这是一系列举动的开始。这些举动将个人编织到更大的社会单位中，而在这里说的便是友谊。

表面上看，送礼是单方面的自愿行为，实际上送礼物是要求还礼的，这样礼物就建立起共同的纽带。与市场交换不同，礼物不易计量，回礼的时限也没有明确的规定。礼物的这些特征增加了其心理上的吸引力。市场交换满足物质需要，并能积累财富；礼物交换则满足个人的荣誉感，同时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礼物肯定了某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因为它自然地展现了赠与者的内在心理倾向。这并非说礼物交换是真正无私或自然的。相反，礼物通常助长了赠与者的雄心或收礼人对礼物的需求。这里要说明的是，礼物首先在社会而非经济领域中运作。

最好将礼物赠与、市场交换看作抽象模型或“理想模型”（马克斯·韦伯语）。正如没有纯功利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我们也难以找到一个社会，说它是纯粹基于礼物交换且尚未“发展”到占

有商品的阶段。例如，欧洲人在18世纪首次接触了塔希提人（这段接触历史得到了详细记录，非同寻常），发现他们以易货贸易的形式熟练掌握了市场交换。我们可以在人类学的奠基著作，即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中看到“金姆瓦利”（gimwali，即易货贸易）和“库拉”（即礼物交换）并存。考察某个特定的社会，卓有成效的假设问题不是说人们能否找到礼物交换或市场交换，而是说两者如何存在于同一时空中，并将社会团结成一个整体。马林诺夫斯基笔下的特罗布里恩岛民进行“金姆瓦利”，但是较之高尚的库拉交易，“金姆瓦利”只是平民的一种普通活动。这只是人类学家对市场和礼物交换进行实地考察后得出的看法。每一个土著社会都有其历史，能在商品和礼物之间找到平衡。不管在东亚、欧洲还是世界其他地方，斤斤计较市场交换中商品的价值和慷慨地赠与礼物依旧交织在一起，过去和现在的文化社会、商品社会以及工业社会都是如此。

人们仍然会问这种概括是否同样适用于美国，因为美国是一个建立在追寻幸福的启蒙运动原则之上的移民社会。较之送礼者自发与暂时的慷慨大方，美国社会难道不是在每个场合都坚持即时支付和明确规定回报的原则吗？读者从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转向美国时可能会发现，美国人在对待市场交换时很少赞同特罗布里恩岛民的库拉参与者的贵族式轻视。的确，要承认美国社会中也有许多场合亲朋好友经常会交换礼物，例如结婚时付礼金或买一些饮品。可是，这些实例只能说明美国的礼物赠与仅限于私人场合，与美国经济和公共生活中无情的市场逻辑不同。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社会中，私人之间非常慷慨，公共领域则是利己主义占上风，这种观念是现代化理论的一部分，认为公共领域的礼物赠与属于过去或更传统的社会。美国于是被纳入下述社会范畴：真正“现代的”、无历史根基的社会，是以打破了互负义务的纽带而令人称羡，或者因没有限制个人私利而受人诟病，

但是不管怎样，又不同于注重礼仪的中国或日本、法国或德国。然而，面对惊人的反面证据，仍重新将社会分成礼物赠与社会和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实在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无需多久，人们就能认识到大部分美国经济与其特定的礼物交换习俗并存。

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现代美国大学的经济。美国大学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馈赠”（gifting），而“馈赠”则是一个近来出现的、反映时代精神的动词。19世纪晚期美国全面开始工业化之后，美国一些富裕的中产阶级慷慨解囊，给大学捐赠。在历时一个世纪的捐赠过程中，受益的不仅是哈佛、耶鲁等顶尖的精英机构，一大批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也在受益的名单中。为什么美国人愿意与这些学校分享财产呢？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税收方面的优惠。不过其中礼物赠与的因素要高于税收优惠方面的因素，因为除了给大学提供财政赞助之外，慈善捐赠还可以采取多种其他形式，只要是慈善捐赠，就能享受税收优惠。理解美国公共领域中慷慨捐赠的第一步是观察过去一个世纪中人们考量社会地位的明显因素。一个向下与向上流动迅速的社会，恰恰是要寻找一些得到公众认可的社会价值的符号。高校毕业生将院校变成财富之地，从而提升了毕业证书的象征价值。以哈佛为例，一些商业精英——他们部分靠与中国开展贸易而发家——以波士顿为中心，一掷千金，捐献早期积累的财富，成就了后来这所在20世纪闻名的研究型大学。今天，对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捐赠仍然是一种社会地位上的投资。一些捐赠者捐钱，为的是维护自身学位的含金量。从数量大的说，富裕的捐赠者资助大学的建筑、系列讲座或讲座教授席位。高等院校不会用物质财富回报捐赠者，如果真有物质回报的话，也只是给小额捐赠者一个杯子或一件T恤衫以示感谢，或为大额捐赠者举办一场答谢宴，然而意义深远的是它授予了捐赠者社会威望。

大学只是美国慈善捐赠这个大千世界中的一部分。美国人争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骄傲地在公众领域赠与礼物，可以与19世纪夸扣特尔印第安人奢侈的礼物赠与（读者可以从本书获得更多类似信息）相提并论。20世纪早期，洛克菲勒和古根海姆等财阀建立了他们的基金会，正如我们这个时代比尔·盖茨所做的那样。从小的规模上看，学校、教会和俱乐部也鼓励其成员捐赠。这种捐赠行为很普遍，成为美国经济活动中的重要部分。赠与并没有就此止步：任何组织中，赞助人即强有力的领导者与委托人或属下通过一系列礼物交换、往来贸易形成亲密关系。赞助人和他们的关系像一幅界定实际权力关系的隐形地图，可能与公司的正式等级截然不同。精明的门客知道，为了讨好赞助人，应该少说多做，未雨绸缪，慷慨奉献，这样才能脱颖而出。参与礼物网络的习惯是美国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中的既成部分。它们将继续发挥作用，因为它们深植于日常生活的习惯中，同时让我们获得社会地位、公众认可、属下的敬意和盟友等真正的社会好处。总之应该注意到，我们在对礼物的社会解释上，没有详尽无遗地探讨其动机或意义。美国及其他地方的赠与通常有利他的维度。礼物可促使人们形成一种普遍意识，即“回馈”社会的意识，但人们永远无法一次性就能回报完，或通过人们以身作则，带头慷慨解囊（尽管赠与的数量不多）来帮助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这些利他的动机有其缘起，需要分别深入研究美国的宗教史和政治史。

我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写作《礼物的回归》，即礼物赠与是一种不断进行的交换形式，继续在美国和其他现代工业社会中蓬勃发展。杨美惠的《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与本书相近，充分展示了礼物赠与在中国的情况，其广度和深度不亚于莫斯的著作。最后，希望中国读者不要将杨美惠描绘的礼物交换网络与西方的市场交换两相比较，而应该将它看作一个更大历史主题的地方变种。这个历史主题便是人类通过礼物认知彼此的品性。本书描述了西方话语中有关礼物的论述，我希望这些论述

将促使中美学者对这种普通(也许是普世)制度在各个社会表现出的不同形式加以比较。它们彼此虽然不同,但我们鼓励相互对话,一起来丰富这种制度。

哈里·李伯森

2012 年 5 月

于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

目　录

致　谢 / 1

导　言 / 1

第一章　礼物的危机：沃伦·黑斯廷斯及其批评者 / 7

第二章　自由主义、利己主义和礼物 / 22

第三章　无私的“野蛮人”：原始共产主义理论 / 49

第四章　人类学家与礼物的力量：博厄斯、图恩瓦、马林诺夫斯基 / 76

第五章　马塞尔·莫斯和全球化的礼物 / 111

结　语 / 131

注　释 / 135

参考文献 / 173

索　引 / 181

译后记 / 194

致　　谢

2006 年至 2007 年，我在柏林高等研究院访学，本书的初稿正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我要感谢秋季学期的导师迪特尔·格里姆（Dieter Grimm）与春季学期的导师卢卡·朱利亚尼（Luca Giuliani），感谢他们的盛情。2008 年 6 月，我待在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科学史系，继续展开本项研究和写作。这里要感谢第二分部（Section II）的导师洛琳·达斯顿（Lorraine Daston），感谢她在此时邀请我加入学院。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主任安东妮德·伯顿（Antoinette Burton）批准我在 2009 年秋季休学术假，使我有时间完成本书。

一些学者在不同场合就我对礼物交换的看法提供了宝贵的意见。这些场合包括美国历史协会 2006 年费城年会、柏林高等研究院、康斯坦斯大学召开的近现代史研讨会（Forschungskolloquium Neuere und Neueste Geschichte）、柏林自由大学的比较欧洲史研讨班、柏林自由大学的宗教科学史研究院（Institut für Religionswissenschaft）、蒙特利尔大学的加拿大德国和欧洲研究中心、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学院为庆祝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Z. Davis）八十华诞而举办的历史上的礼物专题研讨会以及法国史研究学会 2009 年圣路易斯年会。

诸多朋友和同事加深了我对礼物交换及其环境——从波利尼西亚到巴黎——的理解。我尤其感谢杰弗里·鲍曼（Jeffrey Bowman）、马里奥·比尔曼（Mario Bührmann）、艾丽斯·康克林（Alice Conklin）、娜塔莉·戴维斯、彼得·弗里切（Peter Fritzsche）、约翰·盖斯科因（John Gascoigne）、托马斯·海德（Thomas Head）、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尔（Jürgen Osterhammel）和范妮莎·史密斯

(Vanessa Smith)等人,他们与我交流,我从他们的著述和评论中受益良多。此外,我要感谢范妮莎·阿格纽(Vanessa Agnew)、菲利普·德斯博里克(Philippe Despoix)、卡塔琳娜·克里赞基克(Catarina Krizancic)和马克·米卡尔(Mark Micale),他们对拙著的个别章节加以评论。两位匿名评审人就书稿提供了详细而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极大地促进了拙著的修改。

本研究的完成,得到了诸多机构的档案管理员和图书馆员的帮助。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的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负责管理大学的历史藏品;柏林民族博物馆(Berlin Ethnological Museum)的管理员安雅·索梅尔(Anja Sommer),引领我浏览了博物馆的档案,我尤其要感谢她们。当代出版记忆档案馆(IMEC)的工作人员尽其所能,方便我富有成效地利用马塞尔·莫斯的大量档案。莱比锡大学图书馆特藏部以及罗切斯特大学图书馆珍本与特藏部的档案管理员和图书馆员允许我使用一些原始资料文件,我对他们也心存感激。

在我研究和写作时,家人多萝茜(Dorothee)、本(Ben)和杰克(Jack)抱着极大的热情与我讨论。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多萝茜帮我找到了合适的题目,同时将本书连贯成统一的整体。

xi

埃里克·克拉汗(Eric Crahan)是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一位理想的编辑,在每个阶段都表现出审慎、有益的职业素养。有幸能和他及其同事一起工作。

罗切斯特大学图书馆珍本与特藏部允许我引用那里所藏的一封伊利·帕克(Ely S. Parker)致路易斯·摩尔根的信函。罗贝尔·莫斯(Robert Mauss)和当代出版记忆档案馆允许我引用马塞尔·莫斯的个人文稿。我在这里也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导　言

本书着重探讨政治的文明性，即探讨能认可对手的人性的习惯与习俗，尽管它们与对手之间可能存在残酷的竞争。这一主题在我专攻的欧洲思想史里，没法纳入现行的任何一个研究领域。我试图把现在的研究主题与过去的研究衔接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我逐渐迷上了马塞尔·莫斯的名著《论礼物：古代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礼物交换一度从现代欧洲话语中消失，后来又回到了现代欧洲话语。莫斯的文章为我提供了切入点，让我深入研究更详细的礼物交换史。[1]

在莫斯生活的年代，四年全面战争（total war）摧毁了一些基本文明。莫斯着眼于他所处时代的冲突，转而研究“古代”或土著社会的行为。他发现前现代社会的社会组织原则与现代的极为不同。他论述的中心地区是大洋洲和太平洋西北岸，赠礼在这些地区是一种相互的义务。他给礼物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声称礼物通常是互惠的，这与现代的观点——礼物只需送出而不期回报——恰恰相反。按照莫斯的分析，个人和群体处于一个模式中，人们不断地送礼、收礼和回礼。这一过程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而社会则形成责任共享的网络。他勾勒了这种基本的礼物赠与模式，用以描述太平洋周围土著社区的情况，但又没有止步于此。相反，他进一步指出，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